



世纪前沿

**The Great Revolutions and
the Civilizations of Modernity**

[以] S.N.艾森斯塔德

S.N.Eisenstadt

刘圣中 译

大革命与现代文明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大革命与现代文明

[以] S.N.艾森斯塔德 著 刘圣中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革命与现代文明/(以)艾森斯塔德
(Eisenstadt, S. N.)著;刘圣中译. —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12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 The Great Revolutions and the
Civilizations of Modernity

ISBN 978-7-208-10878-3

I. ①大… II. ①艾… ②刘… III. ①世界史-现代
史-文化史 IV. ①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5548 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装帧 陆智昌

大革命与现代文明

[以]S. N. 艾森斯塔德 著

刘圣中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4

字 数 210 000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878-3 / D · 2113

定 价 35.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大革命与现代文明

现代化变革中文明的力量(译者序)

S.N.艾森斯塔德是当代新功能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现代化问题专家。他 1923 年出生于波兰华沙，在此之前他的家庭从中欧迁移到波兰。20 世纪 30 年代艾森斯塔德的寡母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从 12 岁开始在巴勒斯坦接受教育。1940 年，他进入了希伯来大学学习，攻读他的本科学位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开始他的教育生涯，1959 年被授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席。1990 年他成了希伯来大学的荣休教授。

他受聘担任了国际上许多著名高校的客座教授，如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苏黎世大学、维也纳大学、伯尔尼大学、斯坦福大学、海德堡大学等。由于他杰出的工作，他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如巴仁奖(Balzan Prize)和马克斯—普兰克研究奖(Max-Planck research prize)。他也是 2006 年霍尔伯格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的得主。

他著作等身，至 2006 年，他一共完成了 50 多部著作，代表性的作品有《一代又一代》(1956 年)、《帝国的政治体系》(1963 年)、《社会的进化与发展》(1966 年)、《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6 年)、《传统、变迁和现代性》(1973 年)、《传统世袭主义和现代新世袭主义》(1973 年)、《革命和社会转型：文明的比较研究》(1978 年)、《庇护、委托和朋友：人际关系与社会信任的结构》(1984 年)、《社会、文化和城市化》(1987 年)、《比较视野下的欧洲文明》(1987 年)、《欧洲与美国的核心框架、抗争运动和社会结构》(1987 年)、《权力、信任和意义：社会学理

论与分析文集》(1995年)、《日本文明：一个比较的视角》(1996年)、《原教旨主义、宗派主义和革命：现代性的雅各宾要素》(2000年)、《民主的悖论：脆弱性、连续性和变迁》(2002年)、《理论和现代化》(2006年)、《大革命与现代文明》(2006年)等。其中《帝国的政治体系》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声誉，确立了他在研究现代化、革命和文明比较方面的权威地位。

艾森斯塔德的研究涉及范围广泛，包括社会变迁、现代性和文明差异等。艾森斯塔德特别关注现代社会不断变迁的文化特征，其关注的视角和其他现代化学者不同，他更加注意文化和结构过程之间的互动，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内部张力和矛盾，而不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致过程。他试图解释世界伟大文明的历史经验，它们的主要发展动力，它们怎样变成现代社会？它们如何走上现代化之路？以及它们如何发展出不同的现代性文化方案等问题。

《大革命与现代文明》是作者2006年出版的一本新书，既继承了作者多年对现代文明发展差异的研究思想，同时也包含了一些新的观点。这本书主要分析了现代大革命发展的文明和历史背景；它们与现代性、现代文明以及多样现代性发展的关系；现代政治体制的动力和革命象征的命运，在不断变迁的现代文明中，它们的动力和困难；社会如何现代化及如何发展出不同的现代性的文化方案。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的一个提升，既包含现代化研究的传统方法和思想，同时包含了最新的政治社会学研究方法，尤其是文化变迁研究、历史偶然性变革的研究都为本书的立论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

本书的第一个重要观点是现代革命并不仅仅是其他学者所概括的阶级冲突、社会不公、精英反叛、经济推动等因素导致的，更重要的是革命所发生的社会的历史文明框架为其他要素提供了条件。历史文明框架在革命发生和革命后果当中形成了关键的作用。作者特别强调这些革命所发生的所谓轴心文明的作用。轴心文明的共有特征是它们都盛行着基本的文化取向和文明前提，这种价值前提常常激发着许多带有强

烈的乌托邦式和普世论导向的社会秩序新类型的愿景。这是革命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与此同时，这些文明所形成的社会具有的组织性和结构性特征也创造了一种总体性框架让这些愿景得以制度化。在这种文明的框架结构之内，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而逐渐产生的各种抗议运动、制度建设、政治表达以及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化之间相互交织，彼此交融。而正是这种结合促进了政治体制和结构变迁与新的总体文明方案现实化的融合。这一点恰恰成为了大革命(Great Revolutions)的特征所在。这种革命的特征在早期经典的现代大革命，如英国内战、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以及晚近的革命，如俄罗斯革命、中国革命乃至越南革命当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当然，产生于不同文明框架的革命及其影响也具有不同的特征。产生这种差异性的原因也与文明框架本身相关。主要是因为在这些文明中产生了不同的轴心世界观的理念，而这些与不同的历史事实和历史偶然性，以及自主知识分子的参与结合在一起，促生了不同的现代性模式。在作者看来，不论这些大革命(无论是早期的欧洲和美国革命，以及晚近的中国和越南革命，甚至还包括伊朗革命)的核心共同点是什么，它们与现代性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革命的差异性在形成不同现代性方案或者多样现代性的具体现实化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书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立足于不同的轴心文明背景，不同国家的革命展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轴心文明大致可以分为所谓的此岸世界取向的文明和彼岸世界取向的文明，两种文明的价值观点和立足点完全不同，其对世俗世界和政治变革的取向与要求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引起了现代世界革命的巨大反差。作者比较了世界上几种典型的轴心文明与革命的关系。例如作为彼岸世界取向的印度文明、此岸世界取向的中华儒教文明、一神教的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作者在分析印度文明的时候指出，在这些彼世文明中也出现了许多乌托邦愿景。不过，它们通常都不关注政治领域的重建和这些文明中出现的宗教精英、教派和异端分子参与政治的模式，它

们的价值取向不同于一神教或者儒教文明的取向。正因为这一原因，在印度社会所产生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欧洲和其他文明的革命。印度的新型社会组织和新共同体的重建基本上与其合法性模式的根本转换或者斗争没有联系。基于宗教价值的虔信和幸运的要害决定了其不同的世俗活动(政治的、经济的和类似的活动)的合法性根基。所以印度的世俗性政治活动并没有带来总体性观念领域的变革和制度化，甚至都没有重建其政治生活的前提和基本的中心与边缘的政治结构。

而其他文明则完全不同，例如中华儒教文明则属于一种此岸世界取向的文明，在这一文明中超验性价值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力量来主导政治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基本前提，而是一种经验的、现实的价值与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一种具有高度控制能力的统治机制。这一文明属于一种中国式变革过程和运动的主要类型的基本制度框架内的汲取模式。也就是说，它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明政治动力类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不像一神论文明国家，其乌托邦理想国以及乌托邦式教派运动并没有引发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政治中心的制度重建。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从宋朝以来)充满了根植于儒家思想和新儒家愿景的变革，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项尝试具有重建政体中心及其前提的倾向。当然，这一倾向在一神论文明中却可以找到”^{*}。

而一神教文明(包括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犹太文明)则又不同于以上的文明，它们的特征是盛行于其社会的此岸世界观和彼岸世界观的不同方式的结合。伊斯兰文明特有的所谓乌玛理念(所有信徒的共同体)成为推行伊斯兰教超验道德愿景的主要舞台，它是在伊斯兰教愿景中的信徒共同体的定义中最有普遍性的要素，这一愿景与对所有信徒的原则性的政治平等的强调紧密相连。正是这一文明核心决定或者影响了伊斯兰世界政治变革的重要模式。在伊斯兰文明中，源于宗教信仰

^{*} 参见本书第七章。

变化，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教派运动，这些教派运动与部落领袖和群体一起发挥作用。这些运动通常不仅仅会导致现有政体的颠覆或衰败，而且还会带来以实现原始的伊斯兰教乌托邦(即乌玛)为目标的新政体的建立。一旦这些政权被成熟地制度化了，它们就会产生世袭的或是帝国的政权。

而基督教文明则不同于以上的文明模式，它从起初开始就逐渐发展出了一种强烈的超验秩序和拯救的世界观，这些观念自身中包括了此岸世界价值取向和彼岸世界价值取向的一些结合。它们与非常特别的地缘政治环境相结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重要的制度形态和政治动力。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多元主义。这种在欧洲制度框架下形成的结构多元主义类型既与纯粹的分权体制有着极大的不同，也与在严密的帝国体制中产生的结构差异性的模式有着巨大的差别。由于这种文化的多元主义，所以西欧的不同制度领域(如经济或文化领域)也在不断变化，并互相产生着强烈的冲击，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领域。这些变化的结果是不同领域的边界不断出现持续性重构、冲突乃至融合。

而革命意识形态中具有至关重要性的要素是对关注于政治秩序重建的强烈的先验愿景的强调，以及按照统治者应该承担其责任的愿景与那些被认定为政治领域之公民的直接路径的公民身份观念。这恰恰是救赎的此岸世界观念和彼岸世界观念的融合。这种融合随着西欧和中欧形成的结构多元主义和社会政治结构、多个权力中心的共在多样性以及政治和共同体边界的持续性变化而得到提升。但是，直到宗教改革、新教主义的发展、启蒙运动、现代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些变革性潜力才引起了政治进程的影响深远的转型，为首先产生于西欧的大革命、现代文明的发展以及现代性的文明化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在轴心文明中，一直持续不断的围绕不同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和

经济结构的斗争和论辩持续存在着，形成了轴心文明发展变革的持续动力。正是这种文明的内在动力创造了不同的制度选择和形式，例如以上文明社会和国家的制度模式。因此，具体的制度集群不仅在不同的轴心文明之间有所不同。这种集群的现实化往往构成不同群体之间争论和斗争的焦点，因此这些制度也会在它们之间发生极大的改变，引起比非轴心社会更大范围的变化和模式的变革能力。

作者在本书中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革命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意象以及现代性政治文化方案给不同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引起了重大的现代性后果。与前文所分析的革命的意象和意识形态乌托邦引起了不同社会不同模式的革命和变革一样，革命所带有的这些要素也同样给革命后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革命的象征主义和意识形态首先产生于基督教世界，尤其是现代性的文化和政治方案更是基于基督教世界文明的变革过程当中，尽管其他文明也具有这一要素的因子，但是并没有形成欧洲现代性方案的强大力量。这种方案被强大的政治力量向欧洲、美洲、亚洲乃至全世界推广，从而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这种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必然导致“确定性标记的丧失”，推动更多的人去寻求新的合法性和基础前提的重构。事实上，确定性标记的丧失和对其重构的追求充满了革命意象的强烈取向当中。这一价值取向“包含着把上帝之国带到人间之国(不论怎么去解释世俗领域)的愿景的实施，包含着形成了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的连续组成要素的总体创新”^{*}。重构确定性标记的追求同时也把不同群体和精英的努力引导到现代性的主要制度规则(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的建构和集体认同的形塑等方面。正是这种强大的动力引导和构建了现代性的基本政治规则和政治体制类型。

然而，作者也指出了现代性发展的另一面，即现代性的破坏性方面。现代性在全世界的扩张并不总是进步的与和平的。现代性包含着

^{*} 参见本书第十五章。

强烈的破坏性倾向。这一点已经被许多激进的批评者所揭示和指出，并且形成了种种批判性潮流。早期现代性不断现实化过程当中，与资本主义发展固有的矛盾和张力一起，其破坏性和否定性维度通过各种方式展现出来。这种展现表现着政治扩张、政治冲突、文明融合、文明吞并，尤其是表现着现代国家和帝国主义体系框架之内的国际冲突交织在一起。其中包含了惨烈的战争和种族屠杀、镇压、排斥等反人道的现象。这种反人道的现象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冲突，它们形成了朝向特殊的现代野蛮主义倾向，例如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这种转变发生于下列现实背景：战争与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的相互交织，战争与那些逐渐成为集体认同象征和公民身份框架中最重要的能动组织(和领域)的国家的相互交织；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客观现实化；欧洲对欧洲之外世界的扩张；战争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与此相关的是，现代性革命及其文明化努力追求确定性标记的重构，其向世界范围的扩张和殖民一方面改变了全世界，建立一套新的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现代性的世界扩张也带来了反向的抗争运动。在西方世界内部产生的后现代运动、新社会运动是对现代性自我固化的一种强有力的反动，同样在非西方世界，“去西方化”的、反现代殖民的、宗教性和社区性的政治抗争运动也是对西方现代化方案的强烈的反叛。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后现代社会的原教旨主义其实也是现代性政治文化方案和现代性革命的结果。作者在本书的第五部分详细地分析了这一问题。这也构成了以现代性方案为蓝本的现代革命事业所造成了社会后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正是革命、现代性和抗争运动诸种要素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的生动展现。

然而，正如作者所力求阐明的，所有这一切都与发生这些运动的文明框架之背景密不可分。文明(不仅仅是现代文明)是世界演变过程的缩影，也是各种变革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文明又是下一次

* 参见本书第十五章。

或者更多的革命与变革的前提。从这一角度看，作者对这一宏大问题的研究具有着非常超前的现实意义。这一研究毫无疑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文明的特征，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全球化世界下文明冲突或者文明融合的可能。

刘圣中

2012年6月1日

前 言

1978年我出版了《社会的变迁和革命》这本书(纽约:自由出版社出版,被译为西伯来语、德语、俄语和葡萄牙语),书中我把革命当做宏观社会变迁的类型来进行了分析,并将其和这种变革和转型的其他类型作了比较。

自那时以来,我再次系统论述了大革命的问题,并将其放到了比较文明分析的框架当中,即比较文明和多样现代性的分析,特别是在轴心文明的分析框架之中。这种分析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际研究项目的焦点。

这种分析的第一步是大革命的分析。革命不仅仅被视作制度的变迁,而且还被视作这种变化与特殊的世界观愿景(这是某种特殊文明的核心)的宣传的结合。

第二步是大革命的文明框架的分析。这种分析强调的是只有在特殊的轴心文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早期现代性带来的文明),不同的结构和社会心理条件(在相关文献中被作为革命的原因予以详细分析的)不仅仅引起了政治体制的衰败,还导致了革命,或者革命性的转型。在这种背景下,我提出:只有结构过程的不同结合(文明框架和历史环境)的分析才能解释在不同社会形成的不同的革命潜力和不同的革命结果。

这个分析的第三步是对大革命和现代性的发展与现实化之关系的分析。即大革命的特殊结果事实上是现代性的文化和政治方案的具体现实化,其中革命意象和活动构成了一种核心的但持续变化的组成要素。这些要素是导致不同的多样现代性的具体事实。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一直在研究这些问题。这些研究与比较文明和多样现代性的研究密切相关，其中与许多同事，特别是在耶路撒冷、哈佛、芝加哥、海德堡、爱尔福特的马克斯·韦伯研究中心、康斯坦茨大学的许多研讨会和工作坊上的朋友一起的研究有关。我曾经和许多学者一起探讨过这些问题，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赛义德·阿约曼德(Said Arjomand)，约翰·阿纳森(Johann Arnason)，伯恩特·吉森(Berndt Giesen)，沃尔夫冈·施卢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爱德华·蒂利阿基安(Edward Tiryakian)，比约恩·维特罗克(Bjorn Wittrock)和杰克·A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他们有关革命的研究著作给我带来了不断的挑战。

本书的第一稿大概在七年前就完成了，但是直到最近，结合我对轴心文明和多样现代性的研究，我才感到有必要对这一问题按照这里所提到的框架对它进行修订。我非常感谢博睿(Brill)出版公司的乔·埃利克(Joed Elich)对出版本书的鼓励和支持。

我想感谢埃斯特·罗森菲尔德(Esther Rosenfeld)和米丽娅姆·巴—西蒙(Miriam Bar-Shimon)多次帮我打印本书，感谢纳达夫·霍热夫(Nadav Horev)和伊戈·桑金(Igor Sankin)在准备本书的脚注方面所做的助理研究工作。

我特别要感谢伊娃·帕特里夏·雷科尔(Eva Patricia Rakel)在编辑和印刷本书方面提供的大力帮助。

本书中我使用的脚注非常有限，这些脚注对我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必要。我们可以在许多相关研究的著作中找到与此有关的丰富的参考书目，包括我有关革命研究的早期作品。

S. N. 艾森斯塔德

2005年3月于耶路撒冷